

# 巨變後的國際形勢

余志遠

## 一·先說大勢

本月二十日德國與蘇聯簽定商業與信用放款協定，二十三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夫飛往莫斯科，在斯大林參加下，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真是晴天霹靂，世界各國無不震驚，英國不樂，法國不安，波蘭恐懼，日本憤怒。希特勒斯大林這一握手，造成國際情勢的巨變，今後的國際情勢又從此開一新頁。

欲推測未來先回朔既往，既往可從歐洲大戰結束時開始。戰後的形勢如此：德國敗了，奧匈分離，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意國不滿所得，法國報了隱忍四十多年的國仇，躊躇滿志。在戰後新形式下，法國為壓制德國興起，連絡中南歐一帶的小國，於是有所謂小協約的成立，共同包圍德國，監視德國。這時德國孤立，蘇聯踞坐歐洲東隅，因經濟制度及立國主義的不同，法國不願親近，英國更深惡之，遂造成德蘇接近的機會。蘇聯缺少機器，德國缺少原料品，兩國正好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德蘇間的商業關係因之極其發達而密切，在一九三一年德蘇貿易達到最高峯，兩國貿易總額約為十一萬萬國家馬克，此種形勢直至一九三五年後，始行改變，至一九三八年德國與蘇聯貿易已由第一位降至第五位。在德蘇商業關係正密切時，托洛斯基曾有一句名言，他說共產主義正與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決鬥，誰能佔有德國，誰就能支配世界革命。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最怕世界革命，因之一般當政者多痛惡蘇聯，尤其是守舊的保守黨人為甚。英國又看到法國在歐洲活躍，威脅英國在歐洲所佔的光榮的超然地位，因之反對法國壓迫德國過甚。英國為滅除蘇聯在德國的影響，為打擊法國

稱霸歐陸，於是對於德國便寄與同情和助力，希特勒的興起，就是獲得英國直接間的幫助而成功的。英國助德，在使新興的德國，西抑法國，東擋蘇聯，既可阻止共產主義西來，英國自己在歐洲的超然寶座也不會為法國奪去，英國在德法蘇的均勢上，保持優勢。英國的均勢把戲到了遠東，就是打擊戰後新興的美國，所以數年前英國在遠東是助日抵美，助日禦俄。希特勒以反共攻蘇，引誘英國，日本也以進攻蘇聯自命，引誘英國，英國都上當了。由於英德和好，致使法英失和，遂給莫索里尼以進兵阿比西尼亞的機會，阿國的生存便在英法矛盾中斷送了。由於英日和好，促成美俄復交，中國的東北四省便在英美矛盾中失掉了。德國再進，意大利在地中海躍躍欲試，於是法蘇定立互助，英法關係重行和好。西班牙內戰起，英國助法而不願幫蘇，敵意而不願開罪德國，西班牙問題遂在英法的干涉下，造成佛朗哥哥的胜利。這時中日戰爭起了，英國為抵制日本獨霸遠東，英美和好，英美商約定立；希特勒併吞奧國，英國阻蹇，英法聯盟成立。這時英國敵蘇之心仍未減，希特勒便以保證「西歐安全」，換取英法默許「進攻東歐」，英法遂以慕尼黑會議，犧牲了捷克的一部份，滿足德國的願望，促成德國東進，也就是促成德蘇戰爭。這次里賓特洛夫訪問莫斯科，據法國名記者塔布衣夫人宣佈會攜有張伯倫訪希特勒時的談話留聲筒，內容多是聲患德國攻蘇的言詞。即是沒有這次證明，英國因立國精神及經濟制度不同，不能與蘇聯建立密切關係，已是盡人皆知的事，英國想促成德蘇或日蘇戰爭也是盡人皆知的事。不料張伯倫導演的德蘇戰爭尚未開始，希特勒於本年三月又在捷克下手，殘餘的捷克全為德國佔領了。英法着了慌，於是東聯波蘭，又

與蘇聯開始英法蘇同盟的莫斯科談話。英法蘇的政治同盟尚未成功，軍事同盟談話又開始，三國參謀的談話尚無結果，里賓特洛夫到了莫斯科。因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英法代表退走，所謂英法蘇的民主結合，也跟着煙消雲散。張伯倫，也可以說英國導演的德蘇戰爭，已因主角無人，無方法排演，英國也可以說張伯倫對於世界局勢導演的職務算是暫時的中止。

## 二、導演易人

英國——張伯倫導演德蘇或日蘇戰爭，德日都伴聽其導演，趁機會在別處佔利益，蘇聯深知英國用心，怕英國導演成功，危及自身安全，所以對於英國的導演，深惡痛絕，誓罵備至，今年三月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中，報告國際情勢，有幾段話涉及英國的導演工作，摘抄如下：

「譬如說，不要妨礙日本同中國打仗，而且最好是讓它去同蘇聯開戰。讓一切參戰國都深深地陷進戰爭的泥潭中去，而且從暗底裏去惹起它們這樣做，讓它們互相消耗，互相削弱，然後等到它們都已經充分疲憊了，那時再挾着生力軍出場，當然是爲了『和平的利益』而出場的。於是以自己的條件，命令那些已經戰得筋疲力盡的參戰國。」

或者，把德國來作例，先把德國讓給了他，雖則是有保障它的獨立的義務的。後來又把蘇台德區讓給了它，讓捷克先去受命運擺佈，破壞任何一切條約義務。然後大家便又在報紙上噁噁不絕地大放謠言，說什麼『俄國軍隊的鞏固』，蘇聯內部的『不安靜』等。它們慫恿德國東進，它們以輕易征服來引誘德國。它們向德國說，你們向布爾色維克宣戰以後，就一帆風順了。我們應該說很像是教唆和鼓勵侵略者。

英法報紙上關於蘇聯烏克蘭所掀起的種種謠言，是很值得注

意的。這些報紙的主筆們，幾乎把喉嚨都喊破了。他們說德國是在向蘇聯的烏克蘭進攻，他們說德國現在已經拿到了有居民七十萬的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他們說不出今年春天，德國就要把三千萬以上人口的蘇聯烏克蘭，同所謂喀爾巴阡烏克蘭相合併了。這可疑的謠言，好像是要企圖激怒蘇聯去反對德國，製造有毒素的氛圍氣，挑撥對德衝突，雖則並無顯見的理由可以發生這樣的衝突。」

蘇聯的當政者斯大林，既然對英國的用意，這樣明白，他怎肯上英國的當——西仇德國，東敵日本呢？於是蘇聯便針對英國的把戲，也在國際舞台上導演一劇，名字是集體安全，實際是陣綫對立。

陣綫對立這部戲的內容，是戰爭驚險片，導演是蘇聯也可以說是斯大林，演戲的主角，一方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英，法，美，所謂『民主集團』，或『和平陣綫』；對手方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德，意，日，所謂『法西斯集團』，或『侵略陣綫』，實際執行導演則是李維諾夫。李維諾夫將陣綫這部戲，在國際舞臺導演了多年，所謂『法西斯集團』，或『侵略陣綫』的德，意，日算是爲他導演在一塊了，現在差的只是對手方英，法，美所謂『民主集團』，或『和平陣綫』了。美國離歐洲較遠，排在一起，一時不易成功，蘇聯願與英法湊湊數，成爲英法蘇，以便與德，意，日旗鼓相當。假使這部戲導演成功，定是大演全武行，陣綫對打，集體開火。其中最吃虧的是英，法，德，意，其次是日本，再次是蘇聯。蘇聯吃虧最小，佔便宜最大，而吃虧最大，犧牲最巨的是幾個資本主義的兄弟國英，法，德，意，日，這時正中蘇聯下懷，認爲資本主義的崩潰與沒落就在此一舉。英國前首相艾登，究竟是小夥子，年青，幾乎上了蘇聯的圈套，七十老翁張伯倫看不上去了，他排去艾登以避免戰爭。從此，英意談判成功，英法加強同盟，英德關係好轉。蘇聯快要導演成功的一部戲爲張伯倫一脚踢零散，集體安全運動破產了，陣綫對立也烟消雲散。張伯倫恨這

部慘劇的導演者蘇聯，於是加強英法關係，以疏遠法蘇關係，對德妥協，以促成德蘇關係的緊張。後來四強會議開成，又排蘇聯於千里之外，蘇聯也算遭了大霉頭。及至今夏開始以來的莫斯科談話，蘇聯百般刁難英法，也或許老執行導演對於英法餘情未斷，對於英法為難不甚，於是斯大林便以莫洛托夫代替李維諾夫，為執行導演。莫洛托夫這位導演來後，作風一變，蘇聯疏遠了所謂民主的英法，加入所謂「法西斯集團」，「侵略陣綫」，與德國為伍，希特勒與史大林成了好朋友，陣綫對立的戲又在改變作風下，導演成功了。希特勒獲得斯大林的協助，聲勢驟壯，態度變硬，與英法的對立立刻尖銳起來，大有即將開火之勢。這幾天，德國為波蘭問題，調動大軍，英法也岌岌滿戰，歐洲局面已緊張到萬分，惟有導演者蘇聯正在那裏拍手微笑，稱讚表演者的雙方德意與英法做戲認真呢？

張伯倫的導演職務讓給斯大林，史大林終於導演成功了陣綫對立，由於導演的更易，表演的場面更換，國際情勢的大轉變因而造成。

### 三、今後情勢

本來定立互不侵犯條約，是蘇聯近年來外交的傑作，即是與它們宣傳上反對的所謂侵略國定互不侵犯條約，也非自德國始。可見宣傳自宣傳，只要與國家的利害有關，不惜違反宣傳，與素所責罵的國家攜手為友。蘇聯從前對於日本會三番五次要求定立互不侵犯條約，均為日本拒絕。日本為什麼拒絕呢？因為英美希望日蘇衝突，日本也以進攻蘇聯作宣傳，在此等煙幕下，獲得英國諒解便於侵華，若是明白與蘇聯定立互不侵犯條約，而直接侵華，豈不是不給英國留一點轉圜餘地麼？日本雖不與蘇聯定約，却與德意結朋友，這是以實力敵對英國監視蘇聯的辦法。這次德蘇定約後，蘇聯又要求德國介紹與日本定立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雖答應蘇聯願作介紹人，恐怕日本未必肯允。因為日本如與蘇聯定約，是更觸怒英法美，歐洲的德意對東亞的日本很難有實力上的協助，英美却能在遠東給日本以大的阻力。依情勢推測，英法失去蘇聯之後，要竭力拉日本，日本失去德國之後，也要緩和英美，不過日本一時還不會與德意反臉，因為留得德意的友好，可

作為向英美交涉的本錢。此外，日本急於應走的路子，即是趕快扶助新生的中國，使它成為安東遠東的一個單位，然後再對蘇可有餘力，聯英和美，也已去掉往時的障礙。東亞的不安，是日本之害，安東東亞，立足於太平洋均勢之回復，這樣不使中國建成立為一個強固的力量就辦不到。

至於德國肯和蘇聯定約，也是目下的利害決定的。目下德國的目標在波蘭，英法已給波蘭以保障，德蘇如果仍不和好，德國侵波，無異前後受敵，重蹈第一次大戰的覆轍。德國先穩住蘇聯，即令與英法發生戰爭，也可容易應付，況且英法肯否為東歐問題掀動參爭，尚是大疑問。希特勒從前以東進攻蘇，交換英法默許對奧捷的行動，那時英法為德意希特勒東進，看着奧捷被德國滅亡。假使在奧捷未被吞併以前，希特勒與斯大林定立此互不侵犯條約，英法一定起而干涉他併奧吞捷。因為希特勒那樣作，就是安定東歐，進攻西歐了，英法當然反對。英法前此德意希特勒東進能肯犧牲捷克，將來為德意他東進，現在的波蘭恐也有被犧牲的可能。張伯倫無論怎樣犧牲別國，他都不管，只要戰禍不先臨到英國身上，他仍要用犧牲小國的辦法，與史太林爭奪國際情勢的導演職務。至於希特勒與斯大林能否對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信守不逾至十年之久，只有天曉得。

蘇聯現在想的更高，他想學第一次大戰時的美國。美國雖然參加第一次大戰，參加的很晚，美國因此成為戰後第一個富強之國，斯大林不是罵英法德意別國打仗消耗，以便到參戰國筋疲力盡時，自己走出來命令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麼？現在史大林也是想學這一套，如果這一次因德波問題發生世界大戰，蘇聯決不肯先參戰，它定等到勝負將決時走出場來，謀自己的利益，或是趁着各國戰後疲憊，社會紊亂時，鼓動革命，推翻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及舊的統治階級。現在它對中日戰爭就是如此，對世界戰爭也是如此，我想只有中國會受它的欺騙，歐洲的政治家不會上他的圈套。

## 內閣改後組的日本外交

吳無吾

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訂立後，世界為之一驚，因為協定條文中規定簽字國之一，不得加入反對其他簽字國之集團，於是各方便認為反共公約已被德國拆破，日本已被德國遺棄，陷於孤立。不過，德國方面則表示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與反共公約，並不衝突，並願居間使日本與蘇聯，也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意大利對於德國的行動完全贊同，則希望日本照德國所希望的作去，並且表示意大利與日本的關係，並不因德國的行動而有變化。蘇聯，則表示願與日本締結幾年來他即想望的互不侵犯條約。

英日談判，英國已承認了中國境內戰事的存在，日本軍隊有維持各地治安的必要與責任，祇是對於天津英租界存銀之交出，與禁止法幣流通問題，英國認為他獨自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須使與該項問題有利害關係的各國有表示意見的機會。這是說，對於中國經濟問題，正如哈立法克斯外相所說的，戰事結束後，終需由各國加以解決，暗示着英國希望日本先恢復了和平，再在國際會議中，將這問題提出討論。日本則希望由英日直接解決。時間與方式的差異，使英日談判，趨於停頓。歐局既緊張，英日談判問題，便無形中無從提起了。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以後，英國的輿論即盡力鼓吹日本已陷於孤立，德國這種行動，是將日本當作第五等國看待，盡力挑撥日德關係。更喧傳蘇聯軍隊向遠東調動，蘇聯將以更大壓力加諸日本。日本改組內閣呼聲既起，英國又努力鼓吹溫和派內閣之有利。英國準備與日本改善關係。法國，追隨着英國，亦步亦趨，有時對於英國所希望的，自己不肯說出口的，法國都能作代言人。

美國自中日戰爭發動以來，即為日人努力求好的對象。用自國軍

艦運送廢廢大使的屍灰一舉，似亦表明美國多少接受日本的好意。其他的軍火供給，更不消說及。正在英日談判聲中，羅斯福於中立法修正案失敗以後，突然的廢除了美日商約，陣線論者指為美國行將制裁日本的先聲。美國人自己則解釋為遠東局勢已變，以故商約需要修改。我們認為美國這種舉動在當時具有兩種意義：第一，阻止英日關於中國問題解決的私相授受。第二，藉重訂商約的要脅，使美人對於東亞大局有發言的機會。換句話說，他要日人承認他是遠東新均勢中的一個要角，並要正確的給予他一個適當的位置。這並不暗示着美國要制裁日本，或調停中日戰爭。果然，德蘇協定成立，美國即暗示日本應與美國改善關係，並且指出商約重訂時，在中國的美國權益，與滿洲國之承認問題，都需要加以討論。他又想以商約作要脅，而與日人講價錢了。

平沼內閣辭職前夕的日本外交環境，就是這樣的。

這是否表現出日本外交已面臨着歧路，需加以選擇呢？平沼是否因外交政策失敗而辭職呢？新內閣是否會有與平沼相反的外交政策呢？

首先，我們指出，只要正視現實，不作宣傳，則我們應承認中日事變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中日事變之解決作基幹的。可助以解決中日事變的，是日本所希求的，能使中日事變延長的，是日本要予以打擊的。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基點。

如果，我們不受宣傳的蒙蔽，我們正確的將實際狀況加以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反共公約之毀棄，並不只是德國要這樣作，日本也要

拆掉他，如果時間已到了的話。

反共公約的作用，在日本積極在中國進行軍事行動時，是有其最大的功效的。他可使遠東與歐洲的行動配合起來，使大英帝國，東邊救火，西邊防水，顧頭顧不了尾巴。只要我們不否認歷史，我們立即可以看出，過去日本在中國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總是與歐洲德意對大英帝國所作的「事件」，先先後後的互相呼應着。自日本決定不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戰爭，而實行所謂經濟建設，與貨幣戰後，反共公約就成爲日本對英要脅的工具。平沼內閣本以增強反共公約自任的，但在今年夏季，英日開始有接近的可能時，縱然德國要求日本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日本還表示不甚願意，這樣，英國爲之心慰。在以反英運動威脅英國然後招開的英日談判陷於停頓以後，日本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呼聲又起。由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反共公約的作用。

在目前，反共公約實際上還沒有廢除，日本仍然可用牠作爲對英要脅的工具，只要歐洲局勢依然在緊張中。如果歐戰爆發，英日妥協成功，那反共公約的作用也就完了。

英日的衝突，固然英國在華權益被侵害是一個爭執點，但英國並不否認關於中國的諸種條約可以修改，英國也已承認日本經過二年作戰後，有他特殊的地位。英日主要的差異點，在於日本要英國先承認並援助他的東亞新秩序，然後再談及英國在華權益與遠東的新均勢問題。英國則似乎要日本先承認他在華的權益與規定遠東的新均勢與勢力範圍，然後再談及承認並援助日本的東亞新秩序。這一點，只要看哈立法克斯承認條約可修改，承認日本有特殊地位，也認爲在華租界與領事裁判權問題，中日戰後應須解決，但是他堅持關於經濟問題，須有別國表示意見的機會方可解決這一串連鎖，便可以表明。爲表示要堅持他的主張，英國支持國民政府與法幣行動與聲明，就成爲工具了。不過爲要真正與日本接近，他也不肯照他聲稱的話作去，這只要看英國援華之「只開樓梯」，便可一目了然。

德蘇協定一經簽定，英報即表示日本已陷於孤立，並時時提議在日英法妥協之下，及早結束中日戰事。這有兩種意義，第一，英法深恐日本在歐局緊張聲中，可以自由的處理中日問題，第二，英法還恐怕日本果真參加德意軍事同盟，那時遠東英法的勢力，在歐戰聲中，雖未必顛覆，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即使日本不援助德意，而只是採取一種待機的形勢，至少也足以牽制英法相當的兵力。這一點只要看英法雖宣稱日本已被德國遺棄，但新加坡軍艦不他調，香港防務繼續加強，即可明白。無論有美國沒有，英法在遠東需要一個善意的日本，而絕不是一個滿懷着敵意或是正在待機中的日本的。

日本急於與英國妥協以解決中日問題，英法急於自軸心國家圈中拉出日本，急於在遠東尋求因蘇聯背信所受的損失的補償，急於減少在遠東的威脅或危險。如此，日本與英國的差異點，便不必然成爲不可泯滅的障礙，程式未必不可以變更。如果歐局更趨於緊張，則一切障礙或者都將不成問題了。

至於美國本身，近數年來外交方面似乎高調多於行動，僅能在國際間造就「奇異」，而不能產生新局勢，在遠東方面，似乎榮譽重於利益。他承認遠東形勢已然變化，他承認日本可修改條約，他承認日本因二年戰爭在華有特殊地位。他所要求於日本的，並不是時常說及的美國在華權益，因爲美國全部在華投資，還不及美國一年的香烟消費額，他只是要求在遠東勢力重新劃定，重新規定新均勢問題時，他應參加。他爲恐怕日本在中國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實，命他承認，他應對中日早結束戰爭。爲要打擊英國的先和與日本互相授受，他希望英國對日本的關係，要注意到美國的友誼，他爲要求有發言的機會，廢止了美日商約。現在他看到英法需要與日本妥協，他又聲稱希望日本先與美國妥協，再由美國的居間，與英法妥協。美國需要榮譽，希望作爲遠東均勢中的一個要角，絕不是重慶政府所想像的那樣正氣凜然。日本在過去不肯先與這只講空洞的均勢問題的美國作交道，而着重於解決中日事變，所以與講現實的英國先行交涉，美日間的差別點，實際上與英日的差別點，正復相同，不過英美的主要差別點，即是美國榮譽重於利益，英國利益重於榮譽。

這許多差異，隨時局更加緊張，或日本在中國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實時，都可使之日漸消滅的。

日蘇關係過去以日本作為目標之一。今後，因蘇聯之背信，日本的反侵略陣綫不要以日本作為目標之一。今後，因蘇聯之背信，日本的對蘇對立將得到更多的鼓勵，對於解決中日問題，更是必要的。不過，日蘇關係也絕不會惡化，因為日本要求的是迅速解決中日問題而達於和平，絕不願再有戰爭。蘇聯的眼光，雖有德蘇協定之簽訂，仍然是轉向西方，或是為要恢復面子，或是為要得點利益。

由上所述，日本的外交環境，並不較以前惡劣，反而因德蘇協定之訂立，與歐局之緊張，使日本更為有利些，他只要站在不偏不倚之地位上，以待機之姿態，臨視世界，則他過去所寤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東西，將會自己送上門來。

平沼的辭職，似絕不是由於外交政策的失敗，而似乎是由於日本已佔據了有利地位，想使日本改組內閣，一新國內耳目，以新人物新姿態來更有利的運用這有用的機會。

可惜，我們中國的外交，仍在陣綫論的尾巴主義支配下，不能有自主的行動，因英美希望與日本妥協，於是我們又再幻想起英美的調停。如果我們可有勇敢的自主的外交，現在正是時機，我們可以使目前遠東的形勢，煥然一新，至少也可使遠東局面的陰霾，為之消失。

獨裁國的外交政策可以有突變，革命政府的外交，可以有突變。一個立憲國家的內閣改換，在外交政策，最多是逐漸的推移，終於轉向新的方向。特別是以整個國運作中日事變孤注的賭賽的日本，內閣的改換，只能表示國策運行的另一階段，外交手段容有變化，但基本的外交政策，以中日事變解決作基幹的外交政策，絕不容有何種改變。因外交手段之需要變化，可以決定關員人事的分配，關員人事更換本身，絕不能創造基本外交政策。

由中日事變以來日本歷次聲明所表現的國策，與平沼辭職前後中日戰事本身的情況與國際環境來看，日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在基幹上不會有何種變化，在手段上，容或有某幾方面的溫和化，某幾方面也將有更激進化的可能。以下將分別的說明一下。在對中國方面，似乎日本將來依然不會容許第三國干涉，這是與日本的榮譽有關的事件。如果重慶政府可以決然的脫離陣綫論者的窠臼，而毅然予以日本精神上的榮譽以滿足，則實際的條件，容或不致過

於苛刻，因為日本自身也正陷於解決事變的困難。否則的話，便是日本所謂獨自建設東亞新秩序政策了。重慶政府與英美人士所希望的調停，不易於實現，除非英美法美各國都已各自先行承認日本的位置，按照日本的方案，加以贊同。這樣的解決，不是調停，只是強令重慶政府接受，這是所謂遠東的慕尼黑。即使這種調解的可能，在目前我們依然還看不到可能的端倪，無論是英國領導的也好，美國領導的也好。因為各國所希求的在目前還只是各國與日本的關係的改善，以中國作中心的各國關係只是附帶的提及，尙不是主題。

我們想日本政府將按照三條路綫進行的獨自對華政策。第一，實行所謂長期經濟建設，重慶所謂「以戰養戰」，這一點由所謂「大藏三傑」都上了舞台，可以看出。第二，繼續進行經濟戰，貨幣戰，利用英鎊集團瓦解，英鎊本身岌岌可危，英國援助法幣的武器，已不適用。今日，使中國法幣崩潰，從而瓦解蔣介石的抵抗能力。這一點，最是中國一般人民所恐懼的。第三，努力推進新政府的樹立。重慶政府所希望的日本新內閣將改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話，似乎無實現的可能。因為重慶的友人，今日已自顧不暇了。更無暇，無力替蔣介石疏通。

對於英美，日本將適應他們要求妥協的熱誠，而誠心的與之接近，先談遠東新均勢後談在華利益也好，先談在華利益，後談遠東新均勢也好。英國所要求的，在目前只是一個承認英國在華權益與政治地位，與在遠東局勢中一個友意的日本，這一點絕不因歐戰爆發與否而有何鉅劇的差異。美國則仍是榮譽問題。這一點，日本是在某種範疇內予以滿足的。

日英美一妥協，中國問題，便成了尾聲，由日本自由處理也好，由英美強迫中國停戰也好，總之，那時如果中日戰事要停止，似乎實際上絕不是由於調停，儘管表面上可如此表示。

日英法美在遠東的關係，將是一個新和局，新均勢。日本當可認識這一點，他的事變解決，只有在遠東新均勢的條件下，可以作有利的，長期的解決。

日蘇的關係，將仍是緊張。日蘇的不侵犯條約，不會先於中日事變解決而簽訂，蘇聯不肯，日本也不肯。日本與反共同盟的關係，在英日妥協未成功前，日本將依然予以支持，這是有用的武器。(八月廿九日晚)

# 論中日的經濟合作

曾寒冰

一個工業落後的農業國家，要從商品市場與半殖民地地位挽救出來，只有一條道路：是努力使國家工業化，但要使國家工業化是要靠工業資本和近代的生產工具科學技術的，所以這裏又需要採用兩個經濟策略：一是積蓄國內的資本，二是利用國外先進工業國家的資本，生產工具和技術，而在需要加速發展以迎頭趕上工業國家的前提之下，後者較前者為尤要。

中國是工業極端落後的國家，不但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之下，即舊式的農業，亦有衰退的現象，農民經濟貧困，無力改良其生產工具與技術，對土地之加肥農產物之去除病害，大多無資力做到。所以國家不能工業化的結果，農業的危機，亦將無從解脫。

中國工業化的途徑，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已指出其原則，在實業計劃中并創具體的規模。總理對於發達工業資本，有兩個具體的方法：一是節制私人資本，二是製造國家資本，製造國家資本就是發展實業，而鐵路，工業，鑛產三者為其大者，在這裏，總理會極力指出利用外國資本，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迫切需要，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他說：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道，第二是工業，第三是鑛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够這樣做出，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是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千英里的鐵路，要能够敷用，應該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

借助外資，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鑛產，我們尚未開闢，所以要趕快開採鑛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助外國資本不可。」

這是中國發達工業的必要途徑，不但中國如此，革命後的俄國，在憲法中亦明白說明要發展生產力須利用外資與外國生產工具，也都是基於上述的原則出發的。但外資的利用，又須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國家必須有獨立自主的政治權力。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利用外資勢將變為外資控制，非但不足以發達實業，反而在外資的控制之下，要加速農業國向半殖民地深化甚至向完全殖民地轉化的過程。這理由極其明顯，因為政治上之不平等，中國受着苛刻條約的縛束，關稅管理之權，操於外人之手。輕稅的外國工業商品之侵入，國內工業製造品不能與之抗爭，這樣，無論以自己資本或利用外國資本來建設工業，都是不能獲得盈餘以從事再生產而使工業得到推進的。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工業建設的本身如此，即交通運輸等事業——如鐵路公路之建設——之利用外資與自己資本來建設者，亦適足以便利外國工業商品的輸入，其結果必致壓倒民族工業使其不得抬頭。所以國際政治地位不能平等，便不能談到國內的經濟建設，更不能談到國際的經濟合作。民生問題亦根本無從解決：總理對於這一點，亦早曾見及，他說：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了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民

## 生主義第四講

接着又說：

「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效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够解決得通，便要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够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

（同上）

所以就中國經濟的本質而言，利用外國資本和生產工具與科學技術，固然是萬分迫切，而取得國際政治地位的平等與經濟行政（如海關之自行管理）主權的獨立，尤為必須的先行條件，這是中國發展民族資本和國內產業的唯一方針，符合這方針的任何國際經濟合作，都是中國所歡迎的。反之，則中國站在保障民族資本的發展與國家全部經濟命脈的目標之下，必將嚴格的加以排斥。

日本是國際的一環，在中日兩國的經濟地理上，民族的共同利害上與東亞整個經濟的利益前途上，兩國尤有在經濟上互相合作的客觀需要，由於經濟上的平等合作，可以泯除政治外交方面的歧異，更可進而消滅以兵戎相見的最後手段，鞏固東亞永久的和平，中國因為工業的落後，對於任何以平等對待我的經濟合作既均所歡迎，則對於先進的工商業國家而又有上述共同關係的日本，自然是更盼能以工商業資本和科學技術參加中國工業化的事業，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以達共存共榮的目的。期待愈殷，實望亦切，在這裏，我們對於與日本經濟合作的願望，深覺有盡情披露，以供日本人士參攷之必要。

第一是中日經濟合作，必須是兩個國家經濟體間的平等合作，幾年來日本國內均在提倡中日經濟合作，在「東亞協同體」，「經濟單

元」，「經濟連鎖」，「經濟集團」，「經濟提攜」等名稱之下極力鼓吹，有時認為「日滿支不可分」，而以為欲構成一個「家長制」或「立體」式的系列，這裏面，日本所意識着的具體方案，我們尙難清楚，不過就九一八以來日本以武力取得了東北政治經濟上的宗主權之後。對於東北經濟經營的事實來看，事實上不是合作，而是推行壟斷，跟着日本軍事的進展，日本資本急流似的奔入東北，工商鐵業的投資，滿洲本地的資本額數祇佔極微的比量，如據日本拓務省殖產局的調查，自九一八至一九三四月止，滿洲投資額定資本為二八八，六一千圓，實收資本為資本一六一，九〇七千圓，其間額定資本日本佔二一七，八五一千圓，滿洲資本僅佔七〇，七六〇千元，實收資本日本佔一一七，九八七千元，滿洲資本佔五三，九一九，這種資本比額的差異，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愈趨劇烈，這表示出的趨勢是：日本資本的獨佔，滿洲資本事實上不過自盡其殖民地之貢納義務而已。所以這樣的經濟合作，確如日本所鼓吹的，是經濟單元的家長制的和立體的。日所本提倡的「日，滿，支不可分」，如果是依據施之於東北四省的成規來施之於中國本部的話。那末同樣也不是合作，而是企圖將中國殖民地化。這樣的合作是中國所嚴閉固拒的，中日所以在戰前不承認日本的經濟合作要求而出之以堅決的抗日行動者，意義即在於此。這是需要日本加以諒解的。所以沒有政治經濟上的宗主權的兩個國家經濟體間的合作，才是中國所要求的，而且只有這樣，中日間才能奠定沒有矛盾衝突的經濟關係。

第二是必須在維持中國經濟行政完整和主權的前提下進行中日間的合作。中國經濟之不能自主——如海關之為外人管理，便是中國變為外國商場而戕賊中國民族工商業發達的惟一因素。日本今後對於我國經濟平等的合作，我們是以盛情盼望其能實現的。但過去以至現在，日本在華北，華中各地的走私，以及控制海關，以便按自己的利益修改出入口稅率使日本商品能順利獨佔中國市場的行動，我們不能



不對日本表示憎憾。因為這不是經濟合作，而是實現中國殖民地化的企圖。中國所以抗戰至今而一班人仍猶豫不敢與言對日之經濟合作者，其原因即在於是。又如就東北而言，開發經濟的許多組織，大多隸屬於滿鐵公司或南滿株式會社，這種進行壟斷組織的經濟行政權，亦操之於滿鐵公司等之手，所以事實上滿鐵公司等便是英國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在喪失了經濟行政完整和主權的上述狀況之下，任何種經濟合作都無意義。而只是殖民地化的特徵。所以維持中國經濟行政的自主和完整，是經濟合作的先決條件，中日不能有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則已，如有之，則其道必由於此。

或者以為中國經濟行政一旦自主之後，日本必不能獲致工商業的利益。這完全是不對的。譬如就海關來說吧，如果日本維持中國海關行政的完整甚至助中國收回海關的管理權而真實地與中國平等合作的話，則中國可以特惠的待遇給予日本，有時且可以提高不以經濟平等合作待我的第三國的商品稅率，使其在我國不易推銷，而特有利於日貨的流暢。這都是絕對可能的事。

第三是在發達中國民族工業前提之下，歡迎日本資本和先進的工業科學技術的參加。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對工業國的交換關係，是農林原料品與工業製造品的不等價交換。這便是中國變為世界工業商品的市場并淪為半殖民地的原因，這事實我們是深切的感到，而亦為日本有識的人士所同樣見及。中國近年舉國所邁進的目標，就是要把農業社會工業化以挽回這種厄運。日本曾提出「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的口號。大有要企圖將中日的經濟合作，固定於這種基礎之上的趨勢。過去日本外務省當局所提的「中日經濟提攜」方案，更具體的根據上述的原則，所以方案內容，便說：「對中國之農業方面，與以技術的援助，獎勵中國棉花之大量生產，由日本大量購買之。」這我們承認：一方面可以使日本紡織工業愈形發展，同時也可以提高中國農民的生活，（這需在不統制抑價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但這種方案

如果在「工業日本和農業中國」的經濟合作的大前提之下普遍地適用起來，則其結果中國變成了純粹農業原料場。固然農業原料品在日本的技術幫助之下，質量方面都得到改進，而且實際上也可得到多少的利益，但一到日本以其工業資本和技術將原料製成工業品。仍然循環地銷在中國的時候，則由農產品質量改良所蒙受的利益敵不過不等價交換的差額損失，結果中國仍不過是貧窮而已。事實上這與半殖民地或完全殖民地並無本質的差異。是決非中國所能容忍的。

我們承認中日經濟合作，在某幾部門內可以這樣。但決不能通盤如此，而忘却了中國要發展民族工業的天然要求。並且在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天然要求之下，日本亦可以適額的資本和工業技術參加，而取得利益的。譬如日本主要的是輕工業基礎。而中國的資源條件富有重工業發展的可能。以適額的資本和技術來參入中國民族工業的這種部門，既不妨礙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同時在輕工業與重工業的互相協調之間，雙方均將享受互利。

總上所論，我們可以知道中國要發展工業是需要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的，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是這樣，而總理的遺教中，也是這樣的具體指出。日本是東亞先進的工商業國家，無疑的是需要牠的參加，我們拒絕日本或懼怕日本的心理，因此也需要改變。但在日本方面，我們也要嚴格的指出，過去甚至於現在日本對華的經濟政策不是平等的合作而是利己的侵略，雙方如果不具誠意來合作，我們沒有話說。但如要謀東亞永久的和平，要由經濟的平等合作，以消除政治外交以至於軍軍上的衝突的話，則雙方均有痛改前非的必要，我們勇於自責，然亦決不認人，希望上述的幾項願望，在日本方面亦能發生深厚的反省。

x  
x  
x  
x  
x  
x  
x

## 陣線論者的輓歌

虞子愚

據中央社八月廿八日重慶電，蔣介石在紀念週後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認為目前國際情形，無論怎樣變化，仍是環繞着一個主流。原文如下：

「中國兩年餘抵抗日本之侵略，實已促起世界人士對和平之重視，而不敢輕易破壞。國際形勢，正在環繞此一事實而演變。現時國際潮流，雖波浪起伏，跡象不一，但顯然已有一主流，為一切國際演變所必從之趨勢，此即反對侵略戰爭與樹立國際正義是。而中國兩年餘之抗戰，實為造成此種主流與趨勢的一個主要因素……」

話倒是冠冕堂皇可惜沒有內容。語調仍然是在陣線籠罩之下，對於陣綫論依然有若干留戀，但衷心則不禁流露出陣綫論的破產。陣綫論者的「反侵略戰爭」與「國際正義」已被史太林的血手拆破了。我們的蔣介石，還沒有看得清楚。

本來，張伯倫的克里夫敦集團與史太林的格別烏都自始至終即暗中明裏在使陣綫論者的論據，失其作用，不過，我們的陣綫論者沈溺於幻想中，怎樣也不能自拔。張伯倫的慕尼黑會議，雖使陣綫論者狼狽，但英蘇談判又使陣綫論者活躍了一時，現在他們的祖師，史太林的格別烏又給他們當頭一棒，使陣綫論壽終正寢了。不過，若干陣綫論者則雖已受到致命的打擊，却又想借屍還陽，想用德蘇不侵犯協定之訂定，來作新的陣綫論的幻想。

在共產黨捧場聲中的陣綫論的來源與變化，大約如下述：

自法國與西班牙人民陣綫成立與組閣以後，共產黨即盡力鼓吹人民陣綫。因為在人民陣綫中，共產黨可以有公開活動的機會。西班牙

內戰既起，共產黨徒便到處高唱保衛瑪德里的軍歌。在這期間，中國的人民陣綫，也以共黨外圍的資格宣告成立。於是保衛瑪德里之歌，就成為加入人民陣綫以圖講戀愛的男女學生們的戀歌。因為穆助佛朗哥的是德意，所以德意與佛朗哥在那時候被稱為法西斯陣綫，而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英法與蘇聯，便被尊稱為反法西斯陣綫。英法繼倡對西班牙不干涉政策，那個高唱反法西斯主義的蘇聯，也於賺得大批西班牙銀行的黃金與白銀以後，把各式舊軍械輸出的生意，暫行停止，偃旗息鼓。

這是所謂反法西斯陣綫的第一次失敗。

在德意軸心成立，歐洲出了一種所謂反獨裁的民主陣綫，反共公約成立，日本進攻中國，這時候人們似稱德意日為侵略陣綫，而反對這三國的行動的，就稱之為反侵略陣綫。

法國布魯姆內閣倒台，西班牙共和政府傾覆，在歐洲各國內，便沒有一陣綫——這種東西了，剩下的只是在國際間的陣綫論了。

按照陣綫論者的說教，世界各國可簡單的分為兩大集團。一種是法西斯主義，也是侵略主義。日本雖然不是法西斯主義，但是他在侵略中國，所以他是侵略陣綫之一員。他本國內的許多政治團體，與政變，也被陣綫論者繪聲繪形為法西斯主義。另一種便是所謂和平陣綫，因為他們不主張以武力改變現狀，而主張維持現狀。因為他是反法西斯的，所以也被稱為民主陣綫。這樣，真正民主的法，與君主立憲的英國，以及在史太林獨裁下的共產主義的蘇聯，都在民主陣綫之中。更因為他們反侵略，所以也稱之為反侵略陣綫。中國現在正與日本作戰，所以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的，民主的。這樣，在蔣介石

個人獨裁下的中國，也由陣綫論者的推崇，兩時時想附於驥尾。

陣綫論者只是在唱高調，實際上，所謂「陣綫」也者，無論是那一方的，侵略的也罷，反侵略的也罷，根本上便沒有成立。陣綫論者只知道唯物史觀中有所謂矛盾的對立，所以國際間便應有所謂對立的陣綫。他們的腦筋，大概簡單到極點，他們不知道按照唯物史觀的說法，世間的事物，本可由許許多多的對立的矛盾綜合的構成，更不知道對立物的統一，所謂相反相成，始終在變化了。

陣綫論者，把一切事物按照他們的腦筋的那樣簡單來簡單化了，他們更由於史大林掌權將及二十年而忘掉了世間諸事都在川流不息的變化。這樣幾年來他們始終在鼓吹「陣綫」。

自捷克在慕尼黑被瓜分後，蘇聯即痛罵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於是陣綫者也羣起而攻之。殊不知在張伯倫走向慕尼黑時，蘇聯的格別烏人員，業已向希特勒提供保證，絕對不實行捷蘇互助公約。這次因蘇聯在暗中活動，張伯倫在台上，結果張伯倫是破壞了和平陣綫，蘇聯仍得自由的唱高調。

希特勒吞併了捷克，英國確實有點着慌。一面自己擴充軍備，一面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希臘諸國的獨立。這時，陣綫論者又行抬頭。及至英國與蘇聯接洽合作時，陣綫論者便興高彩烈，電報打到倫敦去，認為中國正在反侵略中，所以，反侵略陣綫，和平陣綫，應將中國包括在內。但是被中國的共產黨及陣綫論者譽為反侵略陣綫的柱石的蘇聯，竟於英蘇談判舉行將及五個月，已進行到軍事談判的階段，突然與史大林終年罵詈的國社黨領袖，侵略主義者的希特勒，簽訂了商務協定，更進而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如果莫洛托夫最近可到柏林報聘的話，則更有簽訂軍事同盟的可能。反侵略者與侵略者攜手合作了。

這一下，使陣綫論者幾年來的宣傳，完全破產，使陣綫論者，覺

得他們的祖宗已換了心腸。但是「爲尊者諱」，不能像我們這些反陣綫論者去批評史大林，只能退而思其所以，結果，又發現了可辯護的強詞。

陣綫論破產的地方在那裏呢？

第一 他們的國際分野標準，完全失其效用。

和平，侵略，民主，法西斯主義等等不能使用。歷年來被譽爲反和平，侵略，法西斯主義的希特勒，與和平，反侵略，「弱小民族的導師史大林」(用新華日報標語)攜手。自此，舊名詞都將從共黨字典中消滅。他們的辯證法中的矛盾，突然變了質，統一起來。過去他們所根據以劃分國際集團的標準，分析國際離合的理論基礎，根本動搖。過去他們用以宣傳的標語，不能用了。蘇聯，已取締了一切反國社主義的書籍，論文，電影與標語。此後，史大林與希特勒肖像將並排在克姆里宮與紅色廣場上，被共產黨徒膜拜着，卍字與鐮刀與鎚子，將是共產黨徒表示史大林與希特勒合好的標誌。就在中國，也有了反響。重慶電影院演蘇聯反國社主義影片，德國大使館一再抗議，置之不理，報紙，贊助電影院，因爲中國是反侵略陣綫之一員，不能與德交好。現在呢？在蘇聯大使館請求之下，影片不演了。我們的報紙，在陣綫論者支配之下，不反對了，我們是陣綫論的尾巴，對於「導師」的命令，敢不服從，這够多麼滑稽！

因爲反侵略陣綫等名詞之不用，我們的蔣介石，在談話中，也便不敢用了。但是，他還沒有共產黨人的臉皮與服從性，終於不自然的流露出陣綫論的尾巴。我想共產黨應按照西安事變的協定，對他加以警告。

第二 國際正義與信義是陣綫論者據以劃分國際陣營的兩個重要概念。現在所謂國際正義與信義，已根本不存在了。蘇聯如果真正爲求正義的世界和平，無論如何是不能與德國結合的。至少應援助英法，使之可以對德國加以制裁，這是任何具有國際正義感的人所共同希

望的，現在互不侵犯協定一簽訂，德波關係立即緊張，便可看出蘇聯這次行動的意義，不在於求取正義的和平，而在於犧牲正義，以暫保蘇聯的安全。在過去，英法承認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時，李維諾夫，還唱一點高調。德國併吞奧地利時，蘇聯也罵過侵略者。慕尼黑會議後，張伯倫是蘇聯咀咒的對象。希特勒併吞捷克時，蘇聯便不做聲，只是聲明捷克沒有要求他援助。意大利吞併阿爾巴尼亞時，蘇聯一發不講話了。德國意圖東向，英國起而反侵略時，蘇聯又唱起高調，現在，這高調，根本取消了。因為德國提供了二萬萬馬克的貸款，每年一萬六千萬馬克貨物購置量，見錢心喜，史大林為之心動，互不侵犯協定，使史大林感到安全，更進一步，他更將與希特勒合作。這只是自利，那裏有「正義」！

陣綫論者，過去咀咒英法，說他們沒有國際正義。因為蘇聯那時還唱一點高調。現在，便又不說話了。我們的蔣介石，還在那裏希望有所謂國際正義！告訴你們一句話吧，國際間只有利害，沒有正義，正義只是口頭禪！蘇聯就是一個不講國際正義的選手。

其次，談到國際信義。蘇聯在英法作軍事談判中，竟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這是信義嗎？我的字典中，沒有這個解釋。陣綫論者的字典中，恐怕也不會有吧？

國際間既沒有正義與信義，根本便不能有陣綫論者所唱導的國際分野，從而中國便不能在國際分野中尋求到友人。友誼，只是利害通同的別名，而不是正義與信義的結合，陣綫論者的理論基礎，根本破壞完盡了。

我們為什麼反對陣綫論者呢？

在七七事變前，我們反對國內的陣綫論，因為這有使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機會的可能。但是西安事變，使共產黨可以公開活動，七七事變，在舉國一致聲中，所謂「七君子」也者，又可到處搖搖擺擺。陣

綫論者，雖經打擊，依然在活動。

七七事變既起，我們反對國際的陣綫論。

我們認為中日事變！應由中日來解決。我們不能聽從別國的指導，我們不能為別國犧牲，不能為高倡反侵略陣綫的蘇聯作看門狗，我們不能為英法作前哨戰。國際只有利害，沒有正義，英法蘇，都不會為反侵略而與日本作戰。更不會因中國與日本作戰而援助中國。「正義的同情」，「道義的援助」，只能用以鼓勵士氣，不能用以作決定國策的基礎。政治是現實的，不是陣綫論那樣理想的。我們一再指出希冀國際助我之不可恃，英法蘇攻日之不可恃，我們打擊陣綫論者，不要以他們的幻想來模造民衆的輿情。我們希望打擊陣綫論者，使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不要沈溺於陣綫論者的幻想中，不要為陣綫論者作報銷而將中國送掉，我們希望大家理智一點，平心靜氣的理解國際局面，正視當前局勢，為中日事變作一迅速的合理解決。

西班牙不干涉政策實行時，我們指給陣綫論者看，他們不懂得，只罵英法。英意協定成立之後，英法承認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我們告訴他們國際間沒有正義，他們不相信，他們鼓吹阿比西尼亞的游擊隊。德國吞併奧地利，我們更指示給他們看，他們依然堅持陣綫論。慕尼黑會議，給予他們以教訓，他們咀咒綏靖政策。德國吞併捷克，他們稍稍覺到國際正義之不可恃，但亦僅以唱自力抗戰為滿足。蘇聯與日本的漁業協定，張鼓峯事件，庫頁島油業問題，諾蒙罕事件，我們都告訴過他們不要過份高興，但是他們盡力渲染幻像。英國一唱反侵略，他們又活躍，又勾起他們的幻想。中國應可參加，中國又有友人。我們指出遠東不會在內，他們否認。事實的證明，使他們啞然。英蘇談判，在他們心中，認為是必成，我們一再指示給他們絕不會成。遠在去年秋間，我們就指示給他們德蘇行將接近，他們不信，在他們那時的辯證法中，認為矛盾只有對立，不能統一，他們反對我們的推測。現在德蘇果然接近了。他們的論據破產了，他們的幻想消

滅了。他們也會一時惶恐不知所適，但是他們仍不肯認錯，他們依然要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只苦了中國。二年來受陣線論支配的宣傳，改不過來，受陣線論迷蒙的外交政策改不過來。誤建在國際援助上的抗戰政策改不過來。

阿Q式的解嘲之辭，又露於世。他們認為德蘇協定之成立是由於英法沒有誠意的緣故。這並不是由於他們沒有看出蘇聯是將英蘇談判當作向希特勒索價的工具，他們「為尊者諱」自然應當這樣說，除此之外，他們肯自己承認過去觀察錯誤嗎？

蘇聯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並不妨礙英蘇談判，他們又起新幻想，或者他們的陣線論還不至於破產。他們沒有想到果真是那樣，史大林簡直成了娼妓。英蘇談判不成功了，他們又誤信蘇聯的解嘲的宣傳，誤信英法別有用意的宣傳，他們認為日本被德國拋棄，已陷孤立，認為蘇聯將可專力於遠東。中德關係可以改善，德國可以更加援助中國！夢想！讓我們告訴你們吧？

因反公共約之似趨廢棄，更使日本地位有利。一個已訂婚的姑娘，再講戀愛，究竟還不能令人放心。婚約已有取消的可能時，求婚者便會接踵而來。你們懂得這個譬喻吧？蘇聯決不會向遠東注意，他要注意的是西方，波蘭的領土，羅馬尼亞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小國的領土，有一部份過去都是沙皇的領土。要想繼承沙皇的史大林必須要規復失地的。他只能更與德國合作，不會別向遠東。中德關係，只是歐亞航空公司可直飛到柏林而已，那沒有用，在希特勒玩火已玩得不得了的今日，他不會幫中國忙的，

陣線論者，醒醒吧？正視一下過去與目前的現實，不要再作幻想。不過如果你們為要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則你們應尋求更好的證據，不要胡撞亂撞。我教給你們一點乖。用你們的簡單的辯證法，經過抽象抽象的工作，你們可以發現中，蘇，德，三國結合，是很合理的。

第一 三國都是獨裁國家。三國都以秘密警察統治着。人民，只是獨裁者的羔羊。其餘諸相同點不列舉。

第二 三國都要收復失地。蘇聯的失地，前邊已告訴過你們！德國的失地，是今日的爭執點。中國的失地，你們當已知道。

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與共同的要求的三國，在你們的辯證法中，應可歸成一類，組成新的「陣線」。這樣，在你們，陣線論尚未破產，只是質有變化，這是由量到質的變化。

如果你們還想剽竊總理遺教以資掩護的話，這也不難。總理曾主張過中蘇德三國同盟，以謀世界的和平。這是很好的依據，這並不違反遺教！自然總理演講時與現在中間，是有時間的變化的，環境是有了變化的。不過陣線論者似乎並不知道這一點重要。即使注意這一點，也極易於將他們「捨象」掉，而無傷大雅。你們常是這樣的。

宣傳的論據與遺教的依據，我都告訴了你們。但是，我心裏還不肯不認得這樣希望你們，我還是希望你們再回到你們還是中國人，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以中國人的資格，講中國人應講的話，作中國人應作的事。回頭是岸，立地成佛！

陣線論者如果你們理智一點，正視一下過去與現在的現實，不要留戀過去，你們應以中國人的資格，承認你們的理論是破產了。你們陣線論者，也應承認也已死亡，再圖新生。現在我將送你們兩句禱歌：

糊塗一世，誤盡蒼生。

（八月二十九日晚涼風苦雨中）

# 從「抗戰」到「主和」

金效胥

現在有兩種不正確的論斷流行着：一是發生於所謂抗戰者羣中，一是發生於讚成和平者羣中。前者說，當初既然主戰，現在又來主和，豈不是自相矛盾？因此他們對於主和的動機，主和的運動者，主和的目的，都加給些惡意的中傷或污蔑。主和者由於現在主張和平，反對繼續戰爭是對的，如因此忽視應戰的苦衷，否認抗戰的一切價值，推而及之不承認這次抗戰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那就錯了。兩者都不是持平之論，都是囿於一己的偏見，前者由於未認清抗戰與主和的目的，後者沒了解由抗戰到主和的一貫綫索。固然，這種不清晰的混沌謬見，只是很少的一些人具有，也不得不加以闡述，至於別居用心，信口雌黃者輩又當別論了。

我們姑假定從前的抗戰，現在的主和是兩種劃時期的不同主張，即令如此，也是須具有絕大的勇氣，超人的智力，而且富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的大智大仁大勇者才能作出的舉動，決不是私心滔滔，重視個人的權利，地位，名譽者流所敢爲之。因爲以今日之我攻擊往日之我，或否認往日之我，是一種『自我革命』的舉動，是一種『自我反叛』的行動，不是大智者沒有此種見識，不是大勇者不敢有此行動。我們對於此種大智大勇者，欽佩崇拜之不暇，怎肯惡意加以中傷？何況這次由抗戰到主和，並不是前後矛盾，亦不是『主張的自我革命』，而是系統一貫，脈絡相通的。

無論戰，無論和，『戰』『和』本身都不是目的，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宣戰講和是國家的大權，國家以此大權爲手段達到國家生存獨立的目的。汪先生說：

『國家以保衛其生存獨立爲目的，戰而可達此目的則戰，和而可達此目的則和。』

國家生存獨立的目的，不可變更，手段則可以因時勢不同任意使用，戰而不可達到目的則和，和而不可則戰，如和戰皆不可達到目的，即是和戰均不免國家於滅亡，那也只有拚命一戰，落得自己壯烈犧牲，使敵人也受些創傷。所以汪先生說：

『如果日本定要滅亡中國，我們除了戰下去，更無他法。』

和戰的目的既弄明白，我們再說中日兩國的和戰問題。汪先生素來主張與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結，這是由於中國的處境決定的。中國是個正在興起的國家，而在東亞與兩大強國爲鄰，一是蘇聯，一是日本，中蘇的邦交抗戰以前都在若有若無中，而俄國無論是沙皇統治，無論是斯大林統治對中國都是製造亂源，乘機漁利。中日邦交自甲午戰爭以來，從未好轉過。中國聯俄既勢所難能，如再與日本爲仇，雖與英美和好，要知遠水救不了近火，中國處在鷹鄰虎視的日俄二大強國之間，亦難尋一自存之道。所以總理說：『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汪先生說：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而是誠意的。』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對於中日關係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將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寬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和平。」

所謂「一面抵抗」，因為汪先生已看透中國不能戰，又不能延頸受戮，所以須加抵抗。所謂「一面交涉」，因為中日問題一時不能總解決，全面的永久和平不能立刻達到，所以不能不從零星的交涉，局部的和平着手。既不能戰，為什麼由於七七事變，而引起全面戰爭呢？汪先生引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並加以伸述說：

「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

中國既是被迫而抗戰，所以當時流行的口號是「應戰」不「求戰」。周佛海先生在「回憶與前塵」中說：

「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為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更不能戰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餒。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

上引的兩段話將抗戰的實質解釋的明明白白。及至戰爭延續下去，汪先生更是時時想著怎樣可以獲得勝利，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汪先生說：

「我自從抗戰發生以後，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着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等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我於去年十二月九日經過一番劇烈辯論之後，知道在會議裏無採納之望，纔於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以此意見公之國民，而促重慶諸人之反省。」

所說十二月七日的劇烈辯論，當時汪先生

「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

汪先生為什麼冒萬難首倡和議呢？因為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聲明，日本已覺悟中國之不可征服，東亞之不可獨霸。日本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否則錯此良機，救國的抗戰，將變成禍國。汪先生說：

「前年七月為什麼主張抗戰呢？為的是不如此，不能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如今為什麼主張議和呢？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

汪先生既認定非和無以救國，乃忍痛離開重慶，發表電，以為號召，並屢次聲明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政府進行停戰議和的交涉。等待了好幾個月沒有結果，救國家救民族是人人有份的，汪先生為個人良心驅使，各方民衆的催促，開始作救國的奔走。汪先生說：

「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受我的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這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

汪先生的電大家已看到了，今後汪先生一切行動當根據電，貫

激和平主張。

至於怎樣實現和平救國的主張，汪先生已在『怎樣實現和平』一文中給我們以明確的指示。因為『兩國交戰，其回復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戰，第二步是和平談判，第三步是撤兵。』中日停戰很容易，汪先生說：

「如果蔣介石也贊成和平反共，那麼，全國以內，沒有交戰形勢存在，由全國停戰，而全國和平談判，而全國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蔣介石既然無望，則先由部份做起，以次及於全國，實為今日救國的唯一方法。」

汪先生指示我們說：

「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第一步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石以國家民族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能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部份的做起實現和平的工作，固是前後方的行政當局及一切團體的應有責任，但是我們認為這還不夠。此外，必須迅速樹立中央領導機關，以為發號施令的源泉，主持和議，領導各部份共同努力，必可事半功倍。因現在的中央及國民政府在堅持與把持下已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我們還希望它什麼？期待它什麼？現在全國民衆受戰爭之蹂躪，俱在水深火熱之中，渴望和平，真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汪先生更進一步迅速健全黨政的中央機關，以領導民衆行動，加速和平的到來。看了以上的說明，我們總可明白昔日主持抗戰，今日領導和平的行動，前後不僅毫無矛盾，而且是脈絡一貫，息息相通的。現在我們再引汪先生的話結束認昔主戰今主和為盾矛的說明。汪先生說：

「我的解答是，當初以為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的，所以要謀和平之實現。」

「當初以為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最高目的的自然想救中國於滅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國，亦可殉國。如果當

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那麼，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因為只為要能使中國不致滅亡，則最高目的已達，當初的戰，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貫的，沒有一些矛盾。」

「在抗戰期間，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在抗戰開始以前，總是想盡方法不使和平的門終於關閉。」

「我們不問方式，只問條件。只要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生存，則隨時準備討論，準備接受。這是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這種決心由於不忍中國之滅亡而來的，我們的思想始終一貫，並沒有一些矛盾。」

解釋了認昔主戰今主和為盾矛者的疑慮，並糾正了他們的錯誤。我們再來說發生於主和者陣營中某些少數人的錯誤見解。一是他們否認抗戰的價值，一是他們忽視這次戰爭具有民族戰爭的意義。一年多來的中日大戰，中日兩國都有極大的收穫，而且有相互的確認，過去的虛驕，誇大等等心理都消失許多了。中國有一部份不服中國自己是個貧弱國家，又認為甲午之戰是部份的中國與整個日本作戰，所以中國窮，如現在以整個中國與整個日本作戰，日本未必能勝。再就是自認中國地廣人衆物博，日本國小而不富，長久與日本相持，日本決難得了。實際上日本處處進逼，逼到中國退無可退，到了最後關頭，最後關頭既到，大家只有拚命犧牲。還有一些人，相信共產黨的欺騙宣傳，認為中國如果與日本開戰，蘇聯定援助中國抵抗，共產黨亦必放棄其殺人放火的勾當從事民族戰爭。這一些不切實際的打算全為年餘來的血戰打破了。一般人知道了日本國力之強，中國決不是敵手，久戰日本免不了困難，中國更難支持。蘇聯是使中日兩國長期相打，同歸於盡為目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趁火打劫的好手，他們沒有祖國，更無所為中國民族。戰後的慘酷現實破滅了戰前的幻想，大家痛切的感到支持戰爭之困難，戰已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生存，於是希望棄戰言和，這是中國的收穫。

日本也是如此。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以征服中國為標的，認中國是它的囊中物，整取零割，任所欲為。九一八以後日本一部份軍人的野心更熾，他們以為中國可以不戰而屈，蘆溝橋事變，想重收不戰而屈的效果，中國被迫抗戰了，日本乃想以速戰速決的戰略結束中日戰爭。速戰速決已不能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戰爭延長下去，日本認識



了中國民族已非甲午戰時的中國民族可比，感覺到結束戰爭的困難了。戰爭既不能結束戰爭，只有棄戰言和，這是日本的覺悟，這是日本的收穫。

中日兩方皆自知困難，亦互知困難，故皆能誠意的棄戰言和。中日在南京陷落以前，曾因德國調停一度磋商和議，日本所提條件較苛，及至戰爭又進行一年，徐州，廣州，武漢都丟了，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反提出較前為寬大的條件，這是日方覺悟中國之不可征服的明證。汪先生說：

「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為和平談判之基礎。……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日本如果不是因深悉中國之不可征服，為什麼在戰爭的形式勝利更大時降格言和呢？汪先生說：

「不過二十個月的苦戰，中國人固然了解日本作戰力之強，日本人亦了解中國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

由於軍隊和人民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使戰爭能夠支持這樣久，使日本知難而退，使日本翻然改圖，棄戰言和，汪先生說：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顛沛，沒半句怨言，將士奮勇犧牲，前仆後繼，絕無反顧，這是中華民族的元氣，是中華民國生存獨立之所託，日本所以提出和平條件，未嘗不是看重這一點，知道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的。此次和平運動，如果成功，實在是在是拜一般抗戰民衆及軍士之賜。」

中日兩國由於此次戰爭，皆自己認識了自己，也了解對方，中國了解日本國力之強，日本了解中國民族意識之不可侮，所以汪先生說：

「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應如兄弟兩個廝打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

不打不成相識，在中日戰爭中獲得明證。周佛海先生在「中國國民黨

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中也說：

「當時的抗戰，還有更積極，更偉大的意義和價值，那便是從這次抗戰中，打出了中日兩國的澈底覺悟，真正了解，和誠意合作，把甲午以後的一切流水賬，告一個總清算。」

若在戰前，使日本國民承認中國民族意識的堅強，不可能；使中國民族承認日本的國力不會消耗到和中國不能打仗的程度，也不可能。現在不僅有這個可能，而且是互相承認的事實，是什麼收穫的呢？一年多來的血戰打出來的，能說抗戰全沒有意義？能說抗戰沒有收穫？抗戰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就看抗戰所生的效果如何。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獨立生存，抗戰的結果，已使日本伸出和平之手，已使中國有合於正義的和平之門可尋，國家之生存獨立也可賴以保持，就是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能把抗戰的價值估計過低，亦不能估計過高，過低將使我們無所憑藉，過高將使我們由犧牲得來的代價完全糟蹋。要說抗戰一年來，已可使日本停戰言和，抗戰延長下去，豈不可使日本撤兵退走了嗎？這樣將是白白送掉過去抗戰得來的效果，重慶人就是如此想。實際上中國民族意識無論如何堅強，尙沒有達到使日本能由中國潰退的程度。

至於否認這次抗戰為民族戰爭者，更是有些貶抑自己。實際上這次中國空前的戰爭，真做到「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一致參加抗戰了。而且因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被迫而出於抗戰，所以人皆抱定必死之心，在物質上盡其所有，在人力上盡其所能，寧使人與地皆成灰燼，亦不辭與我者周旋，這種精神，這種勇氣，誠足驚天地而動鬼神。日本由於此點才肯與我們釋兵言和，我們也仗恃此點才能與日本平等言和。不然，國土已失了大半，國將不國，我們仗恃什麼與日本言和呢？只是依恃全國民衆為後盾，依恃全民族的不可侮的精神為後盾。抗戰賴有全民族的支持，始到如今，現在全民族的大多數都渴望和平了，我們欲獲得光榮的平等和平，也只有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達目的，大家不要自丟了「竹槓」，那時再想和平也不能了。

專

載

##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周佛海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如何，今後的責任怎樣？這個問題，不僅是每個黨員應該有澈底的了解，就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關於第一點，有兩種極端的議論。第一種議論，以為自從十七年北伐完成以後，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都是禍國殃民的勾當，簡直無一是處。第二種議論，則正相反對，以為國民黨的行爲，沒有壞處，批評國民黨的，無論是好意或惡意，無論是期望或責難，都是反動。失勢失意的軍人政客以及對國民黨抱有成見和偏見的黨外人士，屬於前者。黨內一部份幼稚，淺薄，和狹隘的下級同志，則屬於後者。

我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我並不是沒有認錯的雅量，但是對於第一種議論，却不能全部苟同，而要提出抗議的。攻擊國民黨的議論，我也聽見得很多，但是都是零零碎碎，枝枝節節的議論，沒有一說一說明的可能和價值。不過，除却別有用心，捏造事實的以外，大約可以歸納爲兩點。第一點便是說國民黨不應該一黨專政，第二點便是說這次不應該輕啟戰端。

一黨專政這個名詞，據我所知道的，本來不是國民黨所創用的。因爲國民黨最初就沒有以一黨永久包辦政治的用意。自從民國十三年容共以後，共產黨把蘇俄一黨專制的制度介紹到中國，然後纔產生這個名詞。國民黨的辦法，是把建國的程序，分做軍政，訓政，和憲政

的三個時期。在軍政時期，當然彷彿是一黨專政。但是無論那一國，凡在革命的時期，豈祇是以黨專政，簡直是要以軍專政。我們只要讀過各國革命史，就可明白。所以無論就理論或事實說，軍政時期，在完成革命的必要上，是無可避免的。（反對革命的人，當然爲另一問題。）至於訓政時期，看起來似乎是不許人民參預政治，其實何嘗是如此？建國大綱第八條，「在訓政時期，政府派員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人民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人民能選舉縣官和議員，令他們執行行政和議立法律，可以說是不許人民預聞政治嗎？建國大綱第十四條，「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所以根據建國大綱的規定，在訓政時期，人民不僅可以參預地方政治，還可以參預中央政治。這可以說是一黨專政嗎？至於憲政時期，那更不待說了，所以說國民黨主張一黨專政，那便是誤解或曲解國民黨的主張。這是從理論上說明。我們再看一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的事實。民國十八年，就規定了訓政時期爲六年，明白規定了訓政時期是有期限的。以後雖然在內憂外患交逼之中，仍繼續着草擬憲法，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並且定期召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制定了，代表的選舉，也十九完成了，不幸中日事變發生，不得不暫時中止。這些都是事實，勿容捏造。所以無論從理論方面或事實方面說明，國民黨決沒

有主張一黨專政。固然，在訓政時期，國民黨是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但是這是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所授權的，是約法上所規定的，不是沒有法律的根據。我們也不能因為這點，就說國民黨是一黨專政，而且主張永久一黨專政。還有一部淺薄的人，以為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黨外的人，沒有做官的可能。這尤其是抹煞事實的偏見。實際上民國十六年奠都南京以後，中央各院部的事務官，至少一半不是黨員，其中大部份是從北京政府來的。所以當時下層同志中，還有一句牢騷話，說是「軍事北伐，政治南征。」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明北京政府，幾乎整個搬到南京。至於各地方政府中非黨員的事務官，至少數目不在黨員之下。至於中央政務官中，也不是絕對沒有黨外人士。尤其是民國廿四年改組的行政院中，黨外人士所占的重要地位更不少。這些事實，都是說國民黨並沒有排斥黨外人士，不許其參加政治。

然則訓政時期，一點流弊都沒有嗎？那却不然。一般下級黨部的幼稚黨員，誤解訓政為一黨專政，常常利用黨的招牌，去為非作歹；有些干涉地方行政，使地方官一籌莫展；有些包攬詞訟，把持教育，以肆其營私舞弊的陰謀；有些排斥異己，侮辱鄉紳，以顯其作威作福的手段，他們所作所為，比較他們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紳，還要壞幾十倍。這些地方，都足以授人以反對的口實，予人以攻擊的資料。黨外的一切反感，大都是從這方面發生的。所以談到黨部，便令人切齒，看見黨員，便令人側目。這些也都是事實，我們同志萬不可護短，而不肯坦白的承認。不過我們一方面須承認這些事實，別方面也要認清另外一種現象，便是這些事實，自從民國二十一年以後，因為中央嚴厲的糾正，便漸漸的減少，漸漸的納入正軌了，我們常常聽見下級黨員，發着黨權低落的牢騷，甚至號稱亡黨，便是這個現象的證明。如果只看見壞的一方面，而抹煞改進的現象，那未免太不公允了。

總而言之，國民黨只主張以黨訓政，而沒有主張一黨專政。至於訓政的前半期中所發生的流弊，全由於制度運用的沒有習慣，以及人

的要索的沒有健全。這兩點，在後半期中，已經逐漸糾正，逐漸改良了。不僅不斷的改良不健全的現象，而且不斷的努力作憲政開始的準備。這能說國民黨把持政權，要永久包辦政治嗎？我所說的，都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我沒有絲毫護短之心，更沒有絲毫怙惡之念。不過如果以為訓政便是國民黨的大罪極惡，那我便萬萬不能承認。

其次便是這次抗戰的責任問題，也就是功罪問題。我不覺得這次抗戰，完全是國民黨的罪惡。我現在雖然主和，但是我決不以爲過去的抗戰是無意義，無價值。如果稍爲有一點這樣的意思，那便對不起數十萬傷亡的忠勇將士和無數死傷流亡的同胞。我的判斷是：當時如果抗戰，則國民黨無以對國民！現在如果不講和，國民黨也不足以對國民。換句話說：過去抗戰是功，不抗戰是罪；現在主和是功，不主和是罪。

何以說過去應該抗戰？我在「回憶與前瞻」一文中論着蘆溝橋事變當時的形勢，說兩方「都有不擴大之決心，但都處於不得不擴大之勢」。我又說道：「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的時候一樣，毫無抵抗。因爲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足以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戰當時一部日軍本人的氣餒。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九一八的時候，如果真正的抗戰起來，我想不單不會因抗戰而擴大事件，反將因此而結束糾紛。否則與日本直接談判去覓求和平，也不致使事件越演變越離奇。當時既不戰，又不和。在不戰不和的糊糊塗塗的形勢之下，便把東四省輕輕的斷送了。這個責任，國民黨是沒有法子可以推卸的，這個罪名，國民黨也是沒有法子可以洗刷的。到了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再好的辦法，當然是不擴大，當然是趕快了結。但是當時在華北一部分日本軍人，是何等氣餒，當時何嘗不努力以和平方法來解決，但是終於失敗了。既然不能和，當然只好出之於戰，如果還蹈着九一八當時的覆轍，在毫無抵抗的形勢下，又輕輕的斷送了華北，使日本收不戰而勝的效

果，那國民黨更犯了天誅地滅的大罪了。這便是當時不得不抗戰的理由。此外，當時的抗戰，還有更積極，更偉大的意義和價值。那便是從這次抗戰中，打出了中日兩國澈底覺悟，真正了解，和誠意的合作，把甲午以後的一切流水賬，告一個總清算。在過去，日本總以為中國是可以征服的，總以為中國人民，還是像甲午當時一樣，拖着辦子的劣等民族。中國因為在日本的威脅之下，當然無時無刻不準備打倒日本的侵略勢力。於是日本說中國排日，中國說日本侵華，互相為因互相為果，互相激蕩，互相磨擦，幾幾乎沒有一年沒有令兩國都感不快的糾紛事件。不打不成相識，從這次痛打之中，中日兩國打成相識了。日本知道不能滅亡中國了。日本知道就是以軍隊占領了西康和甘肅，要和元清兩代一樣的統治中國，在現在是不可能了。日本也深知中國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精神的發揚，不是容易可以征服了。中國也知道要把日本的國力，消耗到不能和中國打仗的程度，也是不可能了。（另有用心的共產黨，和一知半解的高調者，當然是另外一種說法，）既然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中國也不能打倒日本，剩下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便是扭着辮子打到底，打到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第二條路，便是兩方伸出大姆指，互稱三聲好漢，大家消釋仇恨，攜着手走上共存共榮的康莊大道。第一條是死路，第二條是生路。到了現在，中日兩國，都覺悟着非走生路不可了。這個覺悟，兩年前是沒有的。這便是抗戰的結果！所以過去數十萬將士和無數人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他們的碧血，灌溉了中日共存共榮的鮮花，他們實在是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國家了。因此，在國民黨訓政的時期，煮出這場滔天大禍，雖然不能說是國民黨的功，至少也不能說是國民黨的罪。因為從一時的仇殺中，得到了永久的澈底了解，從一時的犧牲中，奠定了百年和好的基礎，這個仇殺，是有意義的，這個犧牲，也是有價值的。我前面說：當時如果不抗戰，國民黨無以對國民，當時抗戰是功，不抗戰是罪，就是根據這些道理。

但是到了現在，情形就不同了。到了現在，如果還不講和，國民黨就無以對國民了。所以今後講和是功，不講和是罪了。

戰與和平的手段，國家的生存與獨立，乃是目的。戰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戰。和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就和。這個極普通的道理，誰都應該懂得。過去非戰不可，當然要顧一切的戰；今後非和不可，當然也要不顧一切的和！為甚麼今後不能再戰而要講和？因為如果再戰，就要走上上面所說的第一條路，就是死路。

我們要說明這個理由，最好先檢閱一下抗戰必勝論者所持的理由。我在「回憶與前瞻」一文中，曾經詳細說明，抗戰必勝論者所持的理由，是寄託在國際形勢變化和日本內部崩潰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中。我又詳細說明這個幻想，終於幻想。但是日本自從去年佔領了廣州武漢以後，已經十個月了。這十個月中，軍事上除了佔領南昌以外，只在沿海的地方，若斷若續的小規模的進攻。於是他們便以為日本沒有辦法了。日本既然不能大規模的進攻，又不能立即撤兵。把百萬大軍擺在中國，進既不能，退又不可。於是他們又斷定日本不得了。因為他們又把中國抗戰必勝的理由，寄託在日本的無辦法和日本的不得了了的兩個根據上面。我現在不替日本辯護，說他們有辦法，說他們不得了。但是他們無辦法，不一定就是我們有辦法；他們不得了，不一定就是我們得了。以他們的無辦法為我們的辦法，以他們的不得了為我們的得了，這不是欺人，直是自欺！打仗是相對的，是比較的。我們要從雙方比較的差額之中，去尋求勝負決定因素，不能從單方絕對的現象，推斷戰爭的趨勢。日本固然不得了。如果他們的不得了只有九十九分，而我們的不得了却有一百分，我們就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了。他們固然無辦法，如果他們只要有二分的辦法，而我們的辦法，只有一分，他們也就輪不到最後失敗了。一分的多少，可以決定最後的勝負，我們決不能單以人家的缺點，作我們的優點，不能單以人家的短處，為我們的長處。日本的通貨膨脹，固然是他們的不得了。然而日本

的通貨膨脹，決不能救濟我們法幣的慘落。日本在華百萬大軍的進退兩難，固然更是他們的不得了，然而他們的這個不得了，也不能抵銷我們壯丁徵募武器供給的困難。半年後才發生效力的美日商約廢止，也許是日本將來的不得了。（半年內另訂新約，當然是可能。）但是他們的程度，總不及我們全部海口被封鎖的不得了。最大的限度，也不過只是我們雖然無辦法，必使他們也無辦法；我們雖然不得了，必使他們也不得了。換句話說，最大的限度，不過只能做到我們雖然死，務必使他們也同死。但是我們的目的，是在求生。人家能生，我們固然也要生，就是人家必死，我們也要求生。一個國家，犯不着學青痞潑皮，拿自己的死，去換別人的死。所以我們不能懷着兩敗俱傷的念頭。我們不能消極的以人家的無辦法為我們的辦法，要積極的從人家的無辦法之中。去尋求我們的辦法，再進而為人家也尋求辦法。我們不能被動的以人家的不得了為我們的得了，要主動的從人家的不得了之中，設法使我們得了，更進而使人家也得了。在現在中日兩國都在無辦法，都在不得了的時候，如果立即停戰講和，那末，中國有了辦法，日本也有了辦法；中國得了，日本也得了。中國既然不能在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內部崩潰之中，尋求最後的勝利，又不能因為日本無辦法而有辦法，日本不得了而得了，長此抗戰下去，不管人家亡不亡，人家死不死，我們自己是亡定了，是死定了。如果明明有生路却不去走，偏要走死路，國民黨還對得起人民嗎？近衛聲明和汪先生發電所提議的和平條件，不是亡國的條件，我在「回憶與前瞻」中，已經詳細的說明了。如果和平條件不足以亡國，偏不接受和平；抗戰到底足以亡國，（最大的限度，日本也陪着崩潰，但是中國總不免於亡。）偏要抗戰到底，國民黨難道可以說不負亡國的責任嗎？所以我說過去抗戰是國民黨的功，今後如果再不主張和平，便是國民黨犯下了死罪了。

以上是很客觀的從所謂一黨專政和此次抗戰的兩方面，估評國民

黨過去的功過。所以我對於無保留的攻擊國民黨的議論，是絕對不服的。固然，黨員個人，當然有許多不正當，甚至於犯法的行為，但是，一個黨員在百萬以上的革命黨，焉能保個個黨員都是好的。如果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當然不應以一部黨員個人的軌外行動，便歸罪於整個的，全體的黨。況且黨的中央，過去不斷的在檢閱，在監察，在糾正黨員幼稚或不正當的行為呢？

但是國民黨一點壞處都沒有嗎？那也不是事實。幼稚和狹隘的黨員，不許黨外的人說話，以為批評黨的便是反動，攻擊黨的便是大逆不道，這實在不是持平之論。一個革命黨，一個革命黨員，做錯了事，應該有坦白自承的精神，應該有糾正錯誤的雅量和勇氣。封建時代的皇帝做錯了事，還要下罪己詔，何況為解放民衆而奮鬥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罪惡，就是自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因為黨的內部糾紛，而引起接二連三的內戰！共產黨的猖獗，是不斷的內戰產生的，外禍的緊迫，是不斷的內戰引起的。民國十六年受了共產黨挑撥的當，演成了寧漢分裂。以後便接着演成武漢方面，逼着蔣先生下野，李白又逼着唐生智走開。然而這兩次還沒有很激烈的戰事。等到十八年春天所謂「討桂」事件發生，比較上兩次，就多打了幾仗。以後在一年之中，接着發生了「討馮」之役和唐生智的「叛變」，在河南就打了多少次的內戰。到了十九年的中原大戰，無論在時間上或規模上，都是空前的大內戰了。規模這樣大，時間這樣長的內戰，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共產黨有了機會侵入長沙，有了機會在贛南蔓延發展，致演成到今天不但不能肅清，而且愈益猖獗的形勢。第二，因為中原大戰的持久，雙方都不能下權，於是請東北軍入關，以結束戰事。因為東北最高當局入關，於是又造成瀋陽事變的機會。又因為瀋陽事變沒有毅然決然的方法去解決，只是一味的拖；於是就拖出了這次中日兩國的空前的仇殺。國民革命軍，一共有四個集團軍。北伐還沒有完成，就發生了內戰的萌芽，北伐完成以後，便彼此互相殺殺起來了。假使北伐完成

以後，大家不爭權力，不逞意氣，精誠團結，埋頭苦幹，共產黨那裏有發展而至於猖獗的機會？瀋陽事變，或其他類似的事情，那裏沒有避免的可能？內憂外患，從那裏來的？難道不是國民黨內部糾紛所產生的嗎？固然，在北伐完成以前，所謂直系，奉系，皖系，也不斷的演過走馬燈式的循環內戰。所以我們不能以內戰罪惡，單責諸國民黨。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過去各派各系，曾經不斷的演過內戰，遂減輕了國民黨內戰的罪惡。因此，國家弄到現在這個情形，大部分地方，被日本軍隊佔領，剩下的地方，被共產黨所蹂躪，國民黨是萬萬不能推卸責任的！每個有良心，有勇氣的忠實同志，都要痛覺前非，努力自強。我們再不能懷着以國殉黨，以黨殉人的心思，再不能採用這個辦法了。我們要倒轉過來，以人殉黨，以黨殉國。要有這種精神和毅力，黨才有救，國才有救。

以上所述，是完全根據事實，以客觀的態度，敘說國民黨過去的功罪。沒有含着一點私心，一點偏見。但是往事已矣！國民黨過去為功為罪，這篇糊塗賬，不必再去算，這段傷心史，也不必再去提了！鑒往可以知來，懲前足以毖後，我們且來檢討國民黨將來的地位罷。

中國國民黨今後的地位，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法律地位，一是政治的地位。不過在說明之前，我先要聲明一點，就是中國國民黨，應該罪己，但是決不能放棄立場。中國國民黨的罪己，是自己的良心問題和責任問題，決不是向任何方面討好，尤其不是向任何方面乞憐。同時中國國民黨的堅守立場，決不是排斥其他各黨各派，尤其不是想把持中國的政治，乃是表示我們的自信和自負。我們決不敢自驕和自滿，但是我們却要自信和自負。自信，就是相信我們的主義可以建國，可以救國；自負，就是相信我們的黨，可以擔負這個建國救國的責任。如果沒有這個自信和自負，黨的存在，根本就發生動搖，那裏還有團結各黨各派的資格呢？我們要虛心，但是我們要堅守立

場。這不是偏見，不是成見，更不是私心，乃是一個革民政黨賴以存在的最低的精神條件。我希望公平的讀者，先要了解這一點，然後再看下面的說明。

國民黨並沒有主張一黨專政，乃是主張以黨訓政。訓政，是有一定期限的。而且事實上，已經積極準備召開國民大會，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這個道理和事實，上面已經說過了。所以中國國民黨現在和最近將來的法律上的地位，仍舊是負着訓政責任的黨，仍舊是根據約法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黨。固然，國民黨已經將國民大會準備了十分之九，預備開始憲政，把自己從訓政的地位，退到普通政黨的地位，並且把代行的政權，交回給人民。但是在國民大會沒有開會之前，他的地位和權力，仍舊是沒有變的。因為他的地位和權力，乃是約法所賦與的，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法統，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政治制度。這個法統和政治制度，只有國民大會才能變更。萬萬不能因為和日本打了一仗，便被日本把法統打斷，政治制度打破了。如果日本要征服中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他既然要滅亡中國，當然隨便他要怎樣便怎樣。但是日本再三聲明不是要滅亡中國，再三聲明尊重中國主權的獨立，而且聲明了和平條件的原則，預備和中國講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在召開國民大會的一種辦法之外，真找不出變更法統和政治制度的法律上的根據。固然有許多對於現行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滿。但是制度的善惡，乃是價值判斷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乃是國民黨法律上的地位的問題，儘管這個政治制度萬分不好，他既然是依法產生的，他既然是根據約法成立的，除掉根據合法的手段去變更以外，只有利用外力的壓迫或革命的手段來變更了。利用外力的壓迫，是不會有的。因為第一，日本既然再四聲明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當然不會毫無信義的壓迫中國變更法統和政治制度。第二，除却萬萬無可奈何，應着事實的需要，不得已而在某一局部產生維持地方秩序的組織以外，大約不會有人想利用外力的壓迫，來變

更本國整個的法統和政治制度的。如果有這個心思，那便是亡國的思想。所以利用外力的壓迫來變更法統和制度，在普通人情和道理上，是不會有的。至於用革命的手段來變更，尤其是不可。革命，是要用力量的。在中國，我大膽的說，現在還找不出這樣有組織的力量。所以如果要變更中國國民黨的法律上的地位，只有繼續着戰前籌開國民大會的工作，迅速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的一種方法。在國民大會沒有開會之前，國民黨的法律上的地位，決沒有因為和日本打了一仗，便打得變更了。我想信只要是有法律思想而尊重法治的人，沒有理由可以反駁我這個理論。

在法律上，國民黨雖然仍舊站在訓政的地位，但是在政治的做法上，今後却萬萬不能不許其他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預政治。國民黨固然應該自信能够擔負救國建國的責任，而且準備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個責任。但是却不應該以為其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沒有擔負這個責任的能力，更不能蔑視他們擔負這個責任的義務和權利。國家的情形，危險到這個程度，合全國的人力財力，都不易挽回這個劫運，那裏還能够再分散力量，再引起糾紛呢？遍地的潰兵散匪，怎樣處置？滿目的傷病流亡，怎樣撫輯？被毀的城市和鄉村，怎樣重建？被掘的江河堤防，怎樣修築？被破壞的交通及工商業，如何恢復？快變成馬克，盧布的法幣，如何收拾？隨便的開出幾個題目，已經令我們沒有法子把文章做下去了。何況今後還不單是這些善後的問題呢！中日邦交如何調整？訂立的條約，如何使雙方都能切實的履行？都是要費極大的心思和努力。中日的關係。不能以為原則決定，條約成立，就算是已經調整。將來還有許多難關，要我們去打破，許多具體的困難問題，要我們去解決，這也不是一黨一派所能把持，所能包辦的。所以我相信中國國民黨沒有一個黨員，現在還主張不許黨外派系和人士，參加政治的。即使少數人有這個糊塗的主張，也不能得到黨的通過和採納，事實上，自從去年召集國民參政會以

後，黨外派系和人士，已經參加實際政治了。今後除掉共產黨外，任何黨派，國民黨都願意和他們親密的合作，共同擔負這個艱巨的救國建國的責任。

剩下的一個問題，便是領導問題。國民黨一部份同志的意見，以為和各黨各派合作，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國民黨是站在領導的地位的。各黨各派，應該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擔負救國建國的責任。黨外人士的意見，剛剛相反。他們以為國民黨要領導他們，便是侮辱他們。這個恥辱，幾乎比亡國還要厲害。我聽見有人說，寧肯亡國，不願聽國民黨來領導。我以為雙方的意見，都是錯的。領導，不在紙面，不在口頭，而在實力。如果有了實力，文字上就不寫領導，口頭上就不說領導，實際上是在領導着。假使沒有實力，就是天天喊着領導，時時寫着領導，實際上誰服從你的領導！所以大家都不要在乎面子上。國民黨的同志，不必在文字上，口頭上爭領導，應該實際上負着責任去做，以做成政治的重心。黨外人士，也不必怕聽領導兩個字，無論任何黨派，只要力量能够領導中國的政治，中國國民黨是甘心情願的服從他們的領導的。我們決不以爲領導是光榮，被領導者是恥辱。所以今後中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地位，完全看國民黨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不願向任何方面討好和乞憐。但是在檢閱我們過去的功罪時，我們要自責。由自責而努力自贖。我們不願對任何方面排斥和反對，但是在考慮我們將來的地位時，我們要堅守立場。由堅守立場，而努力完成我們担負的神聖使命。

(完)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一日)

國內：本期大事述評，因篇幅限制，移刊下期。

國際：這一週的國際情勢，仍是推演上周德蘇簽訂互

不侵犯條約，所引起的波瀾。德蘇條約簽定後，英法

防德的西線鬆了些，日本監視蘇聯的西綫撤去，牽扯英國的力量變小，德國却因東綫敵人變成友國，獲得戰略上的優勢，聲勢為之一壯，希特勒就趁着壯聲勢的機會，壓迫波蘭，對英法強硬。

由於德國態度強硬，歐局驟呈緊張，德國動員，波蘭動員，英法召集後備兵入伍，各小國跟着戒備，戰爭大禍的降臨，迫在眉睫，呼籲和平的通電，紛如雪片。美國總統羅斯福分電德元首希特勒，波蘭總統莫錫基，義國王愛德華三世，對德波糾紛建議三項意見：(一)直接談判，(二)將爭點提交公正仲裁，(三)允成立和解手續，並推舉和議人。同時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亦以奧斯陸公約簽字國名義，發表宣言，呼籲和平。教皇庇護斯亦致勸各方息爭言和，荷蘭女王亦請保持和平。波蘭對於羅斯福總統的建議，復電接受，德義則沒有公開的表示。羅斯福總統除電比王，表示共同努力，保持和平外，又二次三番致電希特勒，請其贊成以直接談判或調解方法，解決德波兩國糾紛。這些呼籲和平的通電，不能說沒效力，而德波問題之實際解決，有待於英法的努力。

英法並不是有所愛於波蘭，它們不願意法國征服波蘭，支配波蘭。德國支配波蘭，就等於德國支配歐洲，英法俱難容忍。英外相哈利法克斯於八月二十三日向全國廣播，論及德波問題不能以談判解決的原因，他說：「原因維何，即某一國企圖控制全歐洲，而使其他各國蒙受不利是也。英國民族自有史以來，對於此種企圖，向來認為不得不予以反抗。」法總理達拉第於二十五日向全國演說，其中警句有「吾國茲若坐視其他各國逐一屈服，則其結果所至，吾國不難榮譽墜地，且以友邦淪亡而陷於孤立，亦即莫

得出而援助矣。」英國怕法國因侵略波蘭而控制全歐洲，法國怕因波蘭滅亡危及自身存在，所以英法不惜以戰爭阻止德國侵略波蘭。英國並與波蘭於二十五日在倫敦簽定互助協定，共八條：(一)倘締約國之一方，因受歐洲任何強國之威脅，認為有武力抵抗之必要時，另一方亦必須同樣舉動。(二)倘締約國之一方，直接或間接受歐洲任何國之威脅，認為有武力抵抗之必要時，另一方亦必同樣行動。(三)倘締約國之獨立或中立，遭受經濟或其他暗施之危害時，應即互相援助。(四)互助方法由兩國海陸空軍負責當局討論，以協定另訂之。

(五)在危急時期，雙方對於一切發展，應經常互相通知，俾決定施行互相保證。(六)締約國之一方若與他國締結互助公約，必須通知另一方。(七)倘在上述各種情況之下發生戰事，締約國之一方，在未與另一方進行商討徵得同意之前，不得與交戰國議和停戰。(八)本約有效期為五年，廢止必須在六個月前事先通知。此外英法又努力聯絡意大利企圖拆散德意軸心，而盛傳英軍已有一部份在法國登陸，兩國備戰之忙達於極點。勢非不得已，誰也不願戰，英法備戰之外，英德又開始磋商解決條件，英德公文來往已有三次之多，據傳德國對於歸還但澤自由市及走廊甚堅持，還有交還德國舊有殖民地之企圖。和平交涉在緊張局面下進行，不知緊張的局面將為炮彈打破，或為和平衝破。

日本內閣改組，平沼辭職，阿部信行大將拜命組閣。此次閣潮，大部份原因是受德蘇條約的影響。平沼內閣以加強反共公約為外交骨幹，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訂立，「於是日本不得不拋棄其所奉行關於歐洲之方案，而另製完全新的政策。」新閣人員據三十日電信所傳如下，總理大臣兼外相阿部信行，內務兼厚生大臣小原直，大藏青木一男，陸軍田畑六，海軍吉田善吾，司法宮城長五郎，文部河原田稼吉，商工兼農林伍堂卓雄，遞信兼鐵道永井柳太郎，拓務金光庸夫，內閣書記官長遠藤柳作，企畫院總裁藏相兼法制局長官唐澤俊樹，樞府書記官長堀江季雄。